

## 翻譯「教師」

### ——日系教育小說中受到雙重文化影響的教師典範

陳宏淑

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在中國歷史上，晚清是一個翻譯十分蓬勃的時期，除了實用導向的政治、社會、科學等領域之外，文學翻譯也是一大重點，特別是西方小說的翻譯，吸引了許多文人志士的投入，不僅將小說從原本文學系統中的邊緣位置移至中心位置，也引進了許多中國文學過去沒有的文類，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小說，隨著教育類雜誌的發行，這個新文類在中國逐漸形成。包天笑(1876-1973)是當時譯介教育小說的重要譯家，他翻譯的教育小說大多是從日本的教育小說翻譯或轉譯而成的，這些日文小說有來自西洋的翻譯小說，也有日本人創作的小說。因此，包天笑對題材的選擇、翻案或翻譯的手法、文類的命名等等，必然受到日本很大的影響。其中有一類教育小說的特別之處在於以教師這種特殊對象為主體，且透過其品德言行教化大眾，而這種以教師形象或其學校生活為描寫主軸的特色，似乎也從晚清的包天笑延續到民國之後的葉聖陶(葉紹鈞，1894-1988)。這類日系教育小說不同於源自德國的教育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 Bildung的意思是education或formation, roman的意思是novel,因此Bildungsroman經常譯成教育小說或成長小說)，前者以教師為主角，後者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角，而且後者特別著重於主角個人成長經歷與性格發展。莫瑞提(Franco Moretti)認為，教育成長小說是「現代性」的象徵形式<sup>1</sup>，而據廖咸浩的說法，成長小說是對現

---

<sup>1</sup> 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代性的一種體現，都是對成人世界（「它們世界」、「常識世界」等體制化、規格化思維）的反抗，都是對少數的肯定<sup>2</sup>。這種對抗主流體制的精神，在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或喬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的作品中明顯可見，但是在日系教育小說中卻不見這種精神。

包天笑翻譯的「教育三記」可說是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代表作，此三記分別為《馨兒就學記》(1910)、《埋石棄石記》(1912)、《苦兒流浪記》(1915)。從描寫的對象與故事內容來看，《苦兒流浪記》描寫苦兒浪跡天涯的成長經歷，比較符合西方教育成長小說的定義；《馨兒就學記》雖是描寫學校生活的教育小說，不過故事主角是兒童，故事記述了主角一年當中的心靈成長，兼具了西方教育成長小說與日系教育小說的特色；而《埋石棄石記》的主角是教師，可說是日系教育小說影響之下最明顯的典型，此書譯自日本教育家小泉又一 (1865-1916) 的作品《棄石》。這類日系教育小說很重要的特色是藉由小說中的話語與各種事件，烘托出理想的教師形象。小泉又一在《棄石》的前言便說明自己寫作此書是為了提供足以鼓舞安慰教育工作者的休閒讀物，而他又甚為敬佩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因此親自執筆，希望能描寫出一位「理想的村夫子」（理想の村夫子），藉此傳達給教育界同仁並鼓勵其心志<sup>3</sup>。這種動機呼應了日本明治晚期與中國清末新式教育的興起，當時的社會有了新的教育體制，所以亟需樹立新的教師典範。

由此可見，日系教育小說的盛行，與日本明治晚期及中國清末的社會脈絡息息相關。一九〇一年清朝政府開始新政，新式學堂紛紛成立。一九〇二年與一九〇四年，清政府又先後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與《奏定學堂章程》，可說正式確立了近代教育體制<sup>4</sup>。郭延禮認為中國教育小說的興起，與二十世紀初新式教育的誕生密切相關。當時大批的中小學校成立，中小學生的數量急驟增加。根據清政府學部公布的數字，一九〇九年全國有初等學堂五萬多所，學生一百五十多萬人，中等學堂四百多所，學生四萬多人。新的受眾群體大量增加，也產生了相當大的閱讀需求，刺激了外國教育小說的翻譯，同時也喚起了近代小說家的關

---

1987), p. 5.

<sup>2</sup> 廖咸浩：〈有情與無情之間：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幼獅文藝》第83卷第7期（1996年7月），頁87-88。

<sup>3</sup> 小泉又一：〈はしがき〉，《棄石》（東京：同文館，1907年），頁1-2。

<sup>4</sup> 蕭菊梅：〈教育譯著的導入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11年3月），頁27。

注。他們在翻譯小說的影響下，開始從事教育小說的創作<sup>5</sup>。當時中國急需引進並借鑒西方和日本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於是教育小說便成為譯介並傳播西方和日本先進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及教學方法的媒介之一。

包天笑所譯的《埋石棄石記》便是其中一本代表作。此書在一九一一年譯自《棄石》，從《教育雜誌》第三年第一期開始刊登，除了第二、五、九、十期沒有刊登之外，到該年第十二期皆以教育小說之名義刊登在文藝欄底下。作者小泉又一是一位教育家，擔任過教師、校長、教授。他的這部教育小說情節平淡，但傳播教育思想的意味濃厚，這應該與他的背景及寫作動機頗有關係。小泉又一在前言中自承此書寫成後，得到友人的諸多批評：甲氏認為此書構思淺薄，想法陳腐；乙氏認為此書行文艱澀，措辭草率；丙氏則說作者原本就不是以小說家立世<sup>6</sup>，此話大概有替他圓場之意，但也間接暗示小泉又一的確不適合寫小說<sup>7</sup>。包天笑回憶此書時說：「這是日本人所寫的教育小說，作者何人，已不記得<sup>8</sup>，總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學家。其中關於理論很多，是日本人對於教育的看法……那書倒是直譯的，譯筆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覺得很不愜意。」<sup>9</sup>梅家玲指出包天笑此處記憶有誤，因為事實上此書著墨於青年教師春風化雨的事蹟，而非尊師重道的理論<sup>10</sup>。我則進一步認為，包天笑記憶有誤可能是因為全書讀來確實給人說教的感覺<sup>11</sup>，樹立教師典範的動機濃厚，以至於包天笑的印象是書中理論很多，而譯筆不順與不愜意之感，大概也與原著前言中的幾位評論者所見略同。

由此看來，以樹立教師典範為動機的教育小說，雖以小說為名，其文學價值並非重點，其目的在於為教育服務，透過教育小說以及書中的教師角色與情節安排，傳達出對新式教師的期許。例如《埋石棄石記》書中沈寶銓師範學校畢

<sup>5</sup> 郭延禮：〈中國教育小說的初端〉，《20世紀中國近代小說在全球的傳播》，網址：<http://blog.cersp.com/18893/109759.aspx>，檢索日期：2007年7月24日。

<sup>6</sup> 小泉又一：〈はしがき〉，頁2-3。

<sup>7</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6輯（2013年12月），頁8。

<sup>8</sup> 包天笑自己不記得《埋石棄石記》的原作為何，而過去的研究也未曾有人發現《埋石棄石記》是譯自日本教育小說《棄石》，這個發現是我在研究日本教育小說的過程中，經過比對文本之後考證的結果。

<sup>9</sup>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中冊，頁462。

<sup>10</sup> 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入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96。

<sup>11</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頁9。

業之際，校長長篇大論的勉勵之言，期許這些未來的教師能成為有益於國家之教育家<sup>12</sup>；又如沈寶銓與母親對談，論及自己欲效法德國小學教師特爾夫海脫，「謂素伴兒童，引為天職，為小學教師，實一樂境也」<sup>13</sup>。此外，沈寶銓也強調對兒童不宜體罰而應善言勸導。相較之下，新式教師頗不同於傳統私塾教師的形象。傳統塾師多為未能取得功名的秀才或童生，並非原本就立志於奉獻教育大業。未曾受過專業訓練的塾師，多半無法掌握現代的教育方法，而塾師的迂腐，在清末民初也常受到批判<sup>14</sup>。教育小說對新式教師的期待，使得這種新文類成為一種載體，其承載或翻譯的似乎是在人物與情節背後所隱藏的某種思想或話語，透過這種文類，試圖灌輸給讀者大眾某種意識形態或文化知識。以操縱學派的翻譯理論家赫曼斯 (Theo Hermans, 1948-) 的社會學觀點來看，這種意識形態當然與當時的社會脈絡密切相關，從譯作的題材選擇與內容操縱，便可看出歷史關係的影響。赫曼斯認為應該把翻譯作品放在大的脈絡下來分析，也就是把歷史脈絡與社會文化考慮進去。「這種翻譯的社會學觀點至少有兩個明顯的長處：首先，它承認譯者是積極而有思想的社會個體，而非一部語言解碼機器或擁有一部好字典的苦力。其次，它把翻譯規範的整個系統納入了更大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結構框架中……再者，文化通常是參照他者 (the Other)，即其他文化，來樹立自己的形象。因此在翻譯這樣一個特殊的領域內，我們可以觀察一種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碰撞以及特定文化吸收轉化其他文化的方式、範疇和過程」<sup>15</sup>。另外，赫曼斯也認為，如果我們將翻譯視為一種功能系統的構成，那麼翻譯的基本功能就在於跨越符際的界線，再現前人的各種論述，而那些再現，可說是前人論述的再次實

<sup>12</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頁8。

<sup>13</sup> 同前註，頁24。

<sup>14</sup> 梁啟超便曾批判：「竊念近世塾師，限於積習，開蒙即訓《學》、《庸》，於古者小學之教，已漠不過問。其上者，高視闊步，聰明自負，即有淺近詩歌，足資童蒙啟發者，又多不屑教讀。其庸庸者，則又墨守成例，《千字》、《百家》、《神童》、《千家詩》之外，不敢稍改舊章，說到講解，則又以為童蒙何足與於此。」轉引自田正平、楊雲蘭：〈中國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0。

<sup>15</sup> Theo Hermans, "Disciplinary Objectives: The Shifting Groun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erspectivas de la Traducción Inglés/Español. Tercer Curso Superior de Traducción*, eds., Purificación F. Nistal y José María Bravo Gonzalo. (Valladolid: Instituto Ciencias de la Educación,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9), pp. 18-19. 譯文見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308-309。

現<sup>16</sup>。

本研究以此角度出發，先探究明治時期教育小說的發展，探查當時日本的社會如何試圖調和歐洲的新思潮與日本傳統儒家思想，再以《埋石棄石記》為個案而加以深究，希望能了解包天笑透過將日文原著《棄石》翻譯成《埋石棄石記》，傳達出或建構出怎樣的教師典範。換句話說，本研究想了解在這本日系教育小說中，包天笑翻譯出來的「教師」反映出怎樣的特質，而經由從歐洲譯入日本，再譯入中國的新式教師形象，與儒家傳統教師形象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交會與調和。

## 二、前人研究

關於近現代教育小說的研究，有人認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小說為李綠園所著的《歧路燈》<sup>17</sup>，這類浪子回頭故事若定義為教育小說似乎過於寬鬆，大部分研究者視《歧路燈》為如《紅樓夢》一般的世情小說，且此書後來未能形成一定的體系而延續下來，同時其教育特點也未能以系統理念的形式展現出來<sup>18</sup>，因此本研究所討論的主要還是晚清至民初盛行的教育小說<sup>19</sup>。如前所述，在中文語境下的教育小說大概分成兩種，一種指的是西方的「教育小說」，原意為性格發展小說，也經常譯為「成長小說」，專門描述主要人物性格形成時期的生活，以及其道德倫理與心理方面的發展。另一種指的則是與教育題材相關的小說，以教師或學生的學校生活為主題。或許因為教育小說是外來的新文類，所以譯介至中國時，詮釋與變動的空間很大，一直以來定義都相當模糊，以至於描寫學校生活或理想教師的小說，甚至是富含教育意義的小說，都常常被歸類為教育小說。

包天笑所譯介的《埋石棄石記》，可以說是第二種教育小說的典型。這種有別於西方教育小說的類型，以教師為描寫主體，對後來葉聖陶的教育小說創作，

<sup>16</sup>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p.142.

<sup>17</sup> 徐云知：《李綠園的創作觀念及其《歧路燈》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5。

<sup>18</sup> 劉小滿：《中西教育小說比較研究》（瀋陽：遼寧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6。

<sup>19</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頁3。

也有相當的影響<sup>20</sup>。然而，過去的研究者對於這類教育小說的源起以及後來的發展似乎著墨較少。韓永勝認為葉聖陶的《倪煥之》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的教育小說，但他的全篇博士論文卻未提及包天笑，只談論西方的教育小說與中國本地約定俗成的教育小說，卻忽略了後者可能受到日系教育小說的影響<sup>21</sup>。劉小滿的《中西教育小說比較研究》提出了倪煥之與盧梭教育觀的雷同<sup>22</sup>，同樣的也只談教育小說受到西方的影響，而忽略了可能受到日本影響的部分。趙娟的博士論文《中國近現代教育小說研究》舉出了包天笑、葉聖陶、老舍作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小說的代表人物，然而其研究就此三個個案分別論述，同樣沒有注意到包天笑譯介的教育小說，與葉聖陶創作的教育小說之間，可能有所關連<sup>23</sup>。這些對於教育小說的研究<sup>24</sup>，普遍忽略了日系教育小說對中國教育小說發展的具體影響，這反映出目前學術研究對於循著明治日本途徑進入晚清中國的這段翻譯歷史，似乎比較缺乏關注。誠如沈國威所言：「迄今為止我們習慣只把日本途徑當作特定時間、空間下引進西方知識的一種特殊現象，強調經由日本傳入的知識本源在於西方，而對於『途徑』的各個側面——建立的時間、機制、社會之反應、通過日本途徑傳入的知識的具體情況以及途徑對知識本身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等，研究的力度尚嫌不足。」<sup>25</sup>

而目前關於包天笑的研究，大多著重於包天笑個人以及他對清末民初翻譯的貢獻，針對教育小說的翻譯探討並不多見，且這些研究大多是史料的呈現，例如禹玲與湯哲聲的〈包天笑教育翻譯小說「三記」〉便列表整理出包天笑以教育

<sup>20</sup> 筆者另一篇論文對於葉聖陶受到包天笑教育小說的影響有詳細的討論，參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一文。此外，筆者也發現葉聖陶的短篇小說〈風潮〉描寫歷史教員與學生之間的衝突，學生考試拒不作答，與老師抗爭。這段情節與《埋石棄石記》一開始的師生衝突非常相似。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筆者發現葉聖陶的《倪煥之》後來翻譯成日文，以〈小學教師〉為題名，收在《五四文學革命集》，譯者為竹內好，一九六三年由東京平凡社出版。這種以教師為主角的教育小說，從日本輸入，又回頭輸出到日本去。

<sup>21</sup> 韓永勝：《中國現代教育小說概論》（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

<sup>22</sup> 劉小滿：《中西教育小說比較研究》，頁17。

<sup>23</sup> 趙娟：《中國近現代教育小說研究》（保定：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論文，2011年）。

<sup>24</sup> 韓永勝、劉小滿、趙娟三篇論文的文獻探討，均引自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頁4。

<sup>25</sup>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243-244。

爲主題的翻譯和創作，但這類研究或許礙於篇幅所限，未能有系統的真正深入從文本中來觀察分析包天笑的翻譯<sup>26</sup>。田正平與陳桃蘭的〈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介與新教育思想的傳播〉<sup>27</sup>概括討論了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譯介情形，也討論了教育小說譯作中的新教育思想及其傳播，但該篇論文將兩種教育小說混爲一談，談的範圍也較廣泛，未能深入探討包天笑的譯作。將兩種教育小說混爲一談的，還有胡海義的〈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清末教育小說的興起〉<sup>28</sup>，胡海義分析廢科舉、興學堂對清末教育小說的題材和思想有巨大影響，教育救國成爲清末教育小說的思想主題，教育報刊成爲教育小說的重要傳播媒介，這些論點都言之成理，不過似乎同樣忽略了來自日本的影響。小熊伸一在〈明治後期における教育學術・實際雜誌の創刊とその役割——『教育實驗界』と『教育學術界』を中心として—〉（明治後期教育學術以及雜誌之創刊與其功能——以《教育實驗界》與《教育學術界》爲中心）<sup>29</sup>介紹了明治後期的兩大教育雜誌，其發行宗旨與欄目，與刊載包天笑教育小說的《教育雜誌》有多處相似。就在一九〇二年前後，東京的金港堂與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金港堂投資了大約十萬元給上海商務印書館，而金港堂的多位編輯也利用他們在日本出版市場的經驗來幫助商務印書館<sup>30</sup>，這大概可以說明即便是傳播教育小說的媒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翻譯自日本的教育類報刊。另外要提的是，胡海義提到「包天笑在清末翻譯了《兒童修身之感情》、《埋石棄石記》與《孤雛感遇記》等西方教育小說。同時，又創作《馨兒就學記》等教育小說」<sup>31</sup>，將《埋石棄石記》視爲西方教育小說，又將《馨兒就學記》視爲創作而非翻譯，這種錯誤凸顯了某些翻譯史研究未能追溯譯本身世與實際閱讀文本的結果。

<sup>26</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爲視角的考察〉，頁4。

<sup>27</sup> 田正平、陳桃蘭：〈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介與新教育思想的傳播〉，《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3期，頁208-215。

<sup>28</sup> 胡海義：〈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清末教育小說的興起〉，《教育評論》2010年第6期，頁126-129。

<sup>29</sup> 小熊伸一：〈明治後期における教育學術・實際雜誌の創刊とその役割——『教育實驗界』と『教育學術界』を中心として—〉，《立教大學教育學科研究年報》第34號（東京：立教大學文學部教育學科研究室，1990年），頁75-89。

<sup>30</sup> Michael Gibbs Hill, *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1.

<sup>31</sup> 胡海義：〈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清末教育小說的興起〉，頁127。

梅家玲的〈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也將包天笑譯著的教育小說分成兩類，一類是以學校為主要場景，描寫某一特定時段的師生互動生活；另一類則不侷限於學校生活的主題，而是描寫少年主人翁經歷曲折命運與苦難折磨，終於成長茁壯的過程。梅家玲認為前者開拓了「少年想像」的視界，後者則構成了「苦兒論述」<sup>32</sup>。不過，她關注的是後者的「苦兒論述」，而我關注的是前者的「教育論述」。教育小說所翻譯出來的教育論述，在某種程度上隱藏著教育報刊出版者、作者、譯者的意識形態與控制力量，他們有意識的譯介了一套知識體系，透過由理想教師擔綱演出的故事，把教育論述具體結構化，形成一幅新世界的藍圖。然而，經過本研究的探討發現，這幅藍圖即便投射出對現代（或混合著對明治時期的日本）教育的想像，卻似乎仍脫離不了儒家思維的影響。

### 三、日系教育小說的發展與譯介

要了解這幅藍圖投射出怎樣的想像，必然要尋其根源，探索日本教育小說的形成與發展。柳田泉的《續隨筆明治文學》中有一篇〈明治時代の傾向小説〉（明治時代の傾向小説）指出了傾向小説的分類，其中把社會小說底下再細分為家庭小說、宗教小說、教育小說、戰爭小說等<sup>33</sup>。而家永三郎的〈「教育小説」の系譜とその意義〉（「教育小説」之系譜與其意義）一文指出，明治十年以後的小說喜歡在書名之上，加上一個分隔成兩行小字的副標題，顯示作品的分類稱呼，例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戀愛小說、冒險小說等等，其中也有教育小說<sup>34</sup>。如下圖所示，包天笑的《埋石棄石記》也使用同樣兩行小字的副標題。

依照家永三郎的定義，真正的教育小說，指的是以學校教員與其所處的社會狀況為主題的作品<sup>35</sup>，他所提的例子便是教育小說《棄石》<sup>36</sup>。根據和田敦彥的研究，日本的教育小說始於明治十九年（1886）新井周吉口述、岡野宇太郎筆記

<sup>32</sup> 梅家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中外文學》第35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65-166。

<sup>33</sup> 柳田泉：〈明治時代の傾向小説〉，《續隨筆明治文學》（東京：春秋社，1938年），頁221。

<sup>34</sup> 家永三郎：〈「教育小説」の系譜とその意義〉，《文學》第38期（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53。

<sup>35</sup> 同前註。

<sup>36</sup> 同前註，頁53-54。

02529 誌 報 育 教

小説育  
埋石棄石記

第一章

天笑生

夜霧。沈。淡。瀟。瀟。衣。袖。間。秋。氣。深。矣。時。則。山。容。已。瘦。老。樹。漸。禿。惟。楓。林。方。始。燦。爛。作。婆。娑。老。子。態。也。樹。陰。之。下。見。有。服。學。生。制。服。之。一。人。方。徬。徬。步。遊。其。地。在。某。某。府。立。師。範。學。校。寄。宿。舍。而。時。則。在。九。月。中。旬。之。某。日。夜。八。點。鐘。也。

文 藝 新 報 第 五 五 五 號

教育  
棄石

小泉又一著

空は少の霧をめて地にはうらがれの風吹き。微雲微雨。遠く眺はいたく闊  
けたり。  
来ん多の事とかこの所の昔になつかしき夏の休暇も昔の夢となれば我々は  
かく難いと云く水辺には秋どる紅の樹梢にかかる時雨ごと花山は面振すまじ  
く森は有立るはれなり。白より黒とかは少し小倉の制服も今は捨着なにと  
うらまじみかたるる。……十月もはや中旬！  
夜は八時に間もなかるべし。ここ××縣師範學校寄宿舎にては方に黙修の例

的《教育小説》<sup>37</sup>。事實上，此書的「凡例」當中也提及，「在我國至今尚未有以教育小説為名的書籍」<sup>38</sup>，由此可見和田敦彥的推斷有其道理。從明治二十年代開始，冠上「教育小説」之名的小説開始大量出現。明治三十一年(1898)創刊的《教育實驗界》雜誌開始以「教育小説」為名，刊登廣告徵稿，後來刊登的作品包括無緣居士的〈私の先生〉(我的老師)、三浦圭三的〈女教師〉、宮崎雪洲的〈女教師〉、羊我生的〈小學教師〉等等，和田敦彥認為這算是「教育小説」正式成爲一種文類的開始<sup>39</sup>。東京的金港堂書店在一九〇二年出版了《教育小説》文集，執筆者爲武田仰天子、大石霧山、柳川春葉、德田秋聲、山岸荷葉、田村松魚、幸田露伴，此外，東京的育成會出版了石川榮司的《理想の小學

<sup>37</sup> 和田敦彥：〈「教育」の言説と讀書のパラダイム〉，《日本近代文學》第55號（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96年），頁15-31。網址：<http://fan.shinshu-u.ac.jp/~wada/report/kikufile.html>，檢索日期：2010年7月5日。

<sup>38</sup> 新井周吉口述，岡野宇太郎筆記：〈凡例〉，《教育小説》（東京：鳴東館，1886年），頁1。

<sup>39</sup> 和田敦彥：〈「教育」の言説と讀書のパラダイム〉，頁15-31。

教師》（理想的小學教師）<sup>40</sup>、蓮實珂川的教育小說《村夫子》<sup>41</sup>，新進社出版了天野淡翠與河井咀華合著的教育小說《教師の妻》（教師之妻）<sup>42</sup>，同文館出版了小泉又一的教育小說《棄石》<sup>43</sup>。這些作品都可說是日本教育小說的典型作品，從中可看出「教育小說」描寫的主要是教師或學生的學校生活<sup>44</sup>。

《棄石》的作者小泉又一在日本明治教育史上佔有一定份量的地位，但是關於他的研究卻十分少見，有關他的生平資料也如鳳毛麟角。從出版圖書的目錄來看，他寫過很多教育方面的專著，包括《歐美教育の實際》（歐美教育實際）、《統合教育教科書》、《普通教育學》、《教育史》、《增訂教育學》等等，而《棄石》似乎是他唯一的小說，缺少創作經驗或許是此書前言中那些批評之語的一個原因。他畢業於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過好幾所不同師範學校及中學的教務主任及校長，一八九九年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教授，兼任附屬小學的主事。一九〇一年他奉命到德國留學，一九〇三年回國後，先回原校復職，隨即擔任文部省視學官<sup>45</sup>。

根據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東亞部的網頁<sup>46</sup>，在日本學生百科全書中，記錄了小泉又一於一九〇一年在柏林大學 (Universität zu Berlin) 留學，一九〇二年在耶拿大學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留學<sup>47</sup>。而根據柏林大學日本學生名冊 (Japanische Studente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小泉又一的校友身分記載為文部省官員 (Beamter im Mombushō) 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Direktor des Lehrerbildungsinstituts)<sup>48</sup>。他於一九〇三年回國後，在該年七月於《婦人と子ど

<sup>40</sup> 石川榮司：《理想的小學教師》（東京：育成會，1906年）。

<sup>41</sup> 蓮實珂川：《村夫子》（東京：育成會，1908年）。

<sup>42</sup> 天野淡翠、河井咀華：《教師の妻》（東京：教進社，1904年）。

<sup>43</sup> 小泉又一：《棄石》（東京：同文館，1907年）。

<sup>44</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頁7。

<sup>45</sup> 藤原喜代藏：《明治・大正・昭和思想史》第一卷（東京：日本經濟社，1944年），頁693-694。

<sup>46</sup> Homepage der Ostasienabteilung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網址：<http://crossasia.org/digital/japans-studierende/index/show>，檢索日期：2013年11月10日。

<sup>47</sup> 小泉又一在《歐美教育實際》中也提過「余嘗留學於伊愛納市」，見小泉又一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歐美教育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頁126。

<sup>48</sup> Rudolf Hartmann, "Japanische Studente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1870-1914," *Kleine Reihe* 1(1997): 3-93, 網址：<http://edoc.hu-berlin.de/series/kleine-reihe/1/PDF/1.pdf>，檢索日期：2013年11月23日。

も》（婦人與小孩）雜誌上發表了〈歐米にて觀察したる幼稚園〉（歐美幼稚園觀察），依序介紹他在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所觀察到的幼稚園情形<sup>49</sup>。他在一九〇五年《歐美教育實際》的〈緒言〉當中也提及他留學之事：「今當首述德意志，次及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於德意志稍及其精，於他國則祇涉其粗，因余留學於德，歷時較久，在他國則甚促，且我國今日之教育，率取法於德，故求參考之資於德者必較衆。」<sup>50</sup>這兩份文獻同樣都是德國的部分著墨最多，順序上也同樣依次為德、法、英、美，大概可以看出他確實在德國留學時間最久，之後或許依序參訪了法、英、美三個國家，但都只是如他所言的短暫停留。

而教育小說在中國的發展，應是從羅振玉所創辦的《教育世界》開始，該刊自一九〇三年起，以「教育小說」的名目，連續五期譯載了小說〈愛美耳鈔〉（即盧梭的《愛彌兒》）<sup>51</sup>。另外，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間也刊載了哥德斯密的〈姊妹花〉（The Vicar of Wakefield）<sup>52</sup>、貝斯達祿奇（裴斯泰洛齊）的〈醉人妻〉（Lienhard and Gertrud）<sup>53</sup>、〈迷津筏〉<sup>54</sup>等外國教育小說，以及奧國薩爾曼的兩部教育寓言小說〈吾家千里駒〉與〈造惡秘訣〉<sup>55</sup>。根據田正平與陳桃蘭的統計，五四之前以「教育小說」名義出版的譯介小說約五十多本，多以上海為中心，以教育類期刊為主要的出版園地<sup>56</sup>。《教育世界》這些自日文轉譯的西洋教育小說呈現了個人如何透過家庭、教會、學校的教育而成長，主角可能是一位牧師、一對夫婦或是一個力爭上游，改頭換面的青年，未必是學校教師，而包天笑

<sup>49</sup> 小泉又一：〈歐米にて觀察したる幼稚園〉，《婦人と子ども》第3卷第7號（東京：フレベル會，1903年），頁39-47。

<sup>50</sup> 小泉又一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緒言〉，《歐美教育實際》，頁3-4。

<sup>51</sup> 原著書名為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出版於一七六二年，是法國啓蒙思想家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的著作。

<sup>52</sup> 小說一開頭便指出：「是書為英國哥德斯密所著，原名威克特之僧正 (The vicar of wakefield)。」哥德斯密著，譯者不詳：〈姊妹花〉，《教育世界》第69號（1904年1月），頁63。此作品出版於一七六六年，現今多半譯為「威克菲德的牧師」，作者為愛爾蘭作家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sup>53</sup> 原著出版於一七八一年，作者是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正是小泉又一在《棄石》的前言大表敬佩的瑞士教育家。夏巧尊在其所譯《愛的教育》的譯者序言中，曾提到《愛的教育》給了他盧梭《愛彌兒》及裴斯泰洛齊（貝斯達祿奇）《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動。足見這幾部教育小說在當時有相當的影響力。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著，夏巧尊譯：《愛的教育》（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sup>54</sup> 小說僅於結尾指出：「是書為美國沙斯敦氏所著。」原著及原作者姓名不詳。

<sup>55</sup> 田正平、陳桃蘭：〈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介與新教育思想的傳播〉，頁210。

<sup>56</sup> 同前註，頁211。

所翻譯的《埋石棄石記》，也許才是日系教育小說的典型代表。梅家玲認為真正讓教育小說在中國產生影響的是包天笑與《教育雜誌》。她認為包天笑翻譯的教育小說以嶄新的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為當時讀者開啓了迥然不同的教育視界，可說以「集大成」的姿態，體現了清末民初「教育」與「小說」問題的種種糾葛<sup>57</sup>。

選擇教育小說來翻譯，可能並非包天笑所主導，在其翻譯事業的版圖中，他也翻譯許多其他類型的小說，並非單單鍾情於教育小說，因此教育小說的推手其實應該是教育雜誌，而教育雜誌的推手則是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包天笑在山東青州府中學堂擔任監督（校長）時，上海商務印書館便來信請求他寫一種長篇的教育小說或兒童小說，以便在他們出版的《教育雜誌》上連期登載。他自述：「但是我當時意識中實在空無所有，那就不能不乞靈於西方文化界了。」<sup>58</sup>《教育雜誌》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先後設有論說、學術、章程、評論、史傳、教育法令、教授管理、教授資料、教育人物等二十個欄目。從其宗旨與專欄名稱便可看出，這份刊物教化啓蒙大眾並引介教育思想的動機十分強烈。

不過儘管重點在於傳播教育新觀念，但是設置文藝欄目，反映出這類教育刊物可能還是保有文以載道的觀念，想利用文學作品來教化人心，也可能是受到前述《教育世界》的影響，畢竟引進外國教育小說是《教育世界》首先開啓的風氣。《教育世界》的發行期間自一九〇一年五月至一九〇八年一月，而《教育雜誌》則是自一九〇九年二月開始發行，從刊行日期來看，後者似乎扮演了接續傳承的角色，而刊載教育小說，也頗有借鑑自《教育世界》的意味<sup>59</sup>。因此包天笑從第一期的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開始，便長期在《教育雜誌》刊登他翻譯的教育小說，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可以想像他在選書的取向上，未必著重作品的文學價值或文學趣味，而是著眼於作品能否翻譯出現代教育的思想與論述，以符合《教育雜誌》的特性。不過後來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一八年九月<sup>60</sup>及一九一九年二月<sup>61</sup>遭到《新青年》的批評，撰文者陳獨秀不滿商務暢銷報刊《東方雜誌》

<sup>57</sup> 梅家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頁 161。

<sup>58</sup>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頁 459。

<sup>59</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之觀點。

<sup>60</sup>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新青年》第 5 卷第 3 號（1918 年 9 月），頁 206-212。

<sup>61</sup> 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 6 卷第 2 號（1919 年 2 月），頁 148-161。

的記者對西洋文明與新思想之指責。一九一九年羅家倫更擴大批評範圍，在《新潮》雜誌的〈今日中國之雜誌界〉對各大雜誌猛烈批評，《教育雜誌》也羅列其中，被羅家倫說成是腦筋渾沌的市儈式雜誌<sup>62</sup>，此時商務印書館開始驚覺新文化氛圍的改變<sup>63</sup>。或許正因如此，一九一九年包天笑的《童子偵探隊》，就成了他最後一篇刊載在《教育雜誌》文藝欄的小說，從此文藝欄也跟著消失，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又出現了「教育文藝」的欄目。《教育雜誌》於一九二二年將主編換成李石岑及周予同。在兩人主編期間，商務印書館的幾大雜誌基本上都由五四之後的進步學人所主控。一九二六年恢復的「教育文藝」欄目，前幾期刊載的是由樊仲雲、鄭振鐸翻譯的外國作品，同年五月刊載了葉聖陶的教育小說〈搭班子〉，一九二七年刊載了他的〈抗爭〉，一九二八年連載十二期他的扛鼎之作〈倪煥之〉。日系教育小說中負有強烈使命感以教育為己任的教師典範，到了葉聖陶的教育小說，逐漸產生變化，葉聖陶筆下的教師或悲苦，或可笑，或悲哀，或無力對抗命運，象徵著教師形象的衰微與教育理想的破滅，這或許象徵五四文人有意與晚清作家區隔的一種表態，但這種變化更可能是反映時局變化的結果。中國知識分子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的淬鍊，使得小說中的教師典範呈現了不同的面貌<sup>64</sup>。

#### 四、教育的現代化：藉由日本翻譯西洋

張之洞於一八九五年撰〈勸學篇〉，提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以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sup>65</sup>沈國威所謂的「日本途徑」，指的也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這一段時間，成千上萬留學日本的中國人，在中國各類學校擔任教師的日本人（亦稱日本教習），以及大量譯成中文的日本書籍，共同促成一整套近代的（主要是來自西方的）新知識傳入中國<sup>66</sup>。

<sup>62</sup>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626。

<sup>63</sup>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年），頁22。

<sup>64</sup> 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之補充觀點。

<sup>65</sup> 羅炳良主編：《張之洞〈勸學篇〉》（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88。

<sup>66</sup>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頁242。

自甲午戰敗之後，清政府官員積極效法日本，主張赴日實地考察，因此當時關於日本學校教育的記載非常多，例如羅振玉的《扶桑兩月記》、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學校記》、吳汝綸的《東遊叢錄》等等。其中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增訂日本歐美教育制度及方法全書》<sup>67</sup>註明了此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小泉又一講演，清國學部大官、各省提學使聽講」，書中小泉又一的〈自序〉便提到清國政府於一九〇六年派學部大官及各省提學使到日本，「先于歷觀各學堂教育現情，請於我專門諸家，以自國教育行政設施上，可資參考之演講」。於是日本文部省特開演講會，請四位文部省視學官演講不同的主題，其中「教授及管理二法者，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小泉又一當其任矣」<sup>68</sup>。此外，據蘇州地方志的記載，教育家章慰高於一九〇四年通過留學考試，由江蘇巡撫咨送中國駐日公使，派赴日本東京巢鴨弘文學院學習教育<sup>69</sup>，章慰高自承此為所謂速成師範也，而當時弘文學院的院長是文部大臣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教授群當中也包括了小泉又一<sup>70</sup>。由此可見小泉又一的演講或課堂講授，影響了來日考察的官員及留日的學生，對中國新式教育的發展也助了一臂之力。

中國在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後，次年(1896)就派遣十三名學生留學日本，希望從日本學習如何吸取西學<sup>71</sup>。日益增加的留日學生對於中國學習日本教育近代化的過程，可說功不可沒，許多介紹日本學校制度的專門書籍，經過留日學生翻譯而介紹至中國<sup>72</sup>，其中小泉又一的多本著作在中國頗為流行，包

<sup>67</sup> 小泉又一：《增訂日本歐美教育制度及方法全書》（東京：東亞公司、富山房書局，1907年）。

<sup>68</sup> 小泉又一：〈自序〉，同前註，頁1-2。

<sup>69</sup> 江蘇在新式教育的推動方面十分積極，根據光緒三十三年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一九〇七年江蘇省教育經費入居全國第三位，僅次於直隸省與湖北省，前者因為是京師的關係，後者因為有張之洞極力提倡教育之故。而在教育經費實際支出方面，江蘇省則位居第二位，僅次於直隸省。由此可見江蘇的教育風氣之盛，包天笑與葉聖陶皆為江蘇人，前者為教育小說的重要譯家，後者為教育小說的重要作家，要說江蘇省是近代教育小說的孕育之地似乎也不為過。蘇雲峰著，吳家瑩編校：《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202-204。

<sup>70</sup> 章慰高撰述，章希聖補記：〈自述教育生活小史〉（1948年），《蘇州地方志》，網址：<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214327.htm>，檢索日期：2013年11月5日。

<sup>71</sup> 徐光台：〈明清西學東漸與中國思想和教育的交流與衝激：回顧與展望〉，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頁271。

<sup>72</sup> 黃新憲：〈簡論近代中國對日本教育近代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鑒〉，《教育理論與實踐》1995年第4期，頁17-18。

括一九〇五年湖北官書局的《學校制度》，由夏紹璞、莫覃瀛、陳湘俊三人合譯<sup>73</sup>，還有一九〇六年東京古今圖書局出版的《教育史》，此書為日本文部省檢定的師範學校教科書（譯者為景耀月、劉鏡蓉）<sup>74</sup>。此外，還有一九〇八年開明書店出版的《教育實用心理學》（譯者為房宗岳），以及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翻譯並出版的《歐美教育實際》和一九一四年文明書局出版的《教育學》（譯者為顧倬），也都是小泉又一的著作。中國近代教育家俞子夷便曾提到：「湯本武比古、小泉又一的著作譯本，當時比較流行，尤其是小泉又一的《小學各科教授法》。一九〇九年前後，我們談論教法時，常常提及前輩教育家，亦不例外。省教育會駐會總幹事，像是熟讀小泉著作者，午晚餐同食，動輒談教法問題，他動輒引小泉書中語為證。」<sup>75</sup>由此可見，當時小泉又一的教育專業著作及其論述在中國有一定的影響力。湯本武比古和小泉又一都曾留學德國，因此可以說德國的新教育思想，藉由這些日本到德國留學的教授傳回日本，他們著書立說，這些來自德國的教育思潮再藉由翻譯又傳入中國。

除了考察團、留學生、專書著作的影響力，教育類雜誌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也不可小覷。王國維所主編的《教育世界》在創辦的前幾年，大量刊登的譯文及論文都介紹了日本的教育法規及學校章程。從第一號到第十八號全文載譯了日本各項教育法規與條例達八十四種之多，後來又陸續載譯日本各項教科書、教育學及教育史專著五十多種，小泉又一的〈歐美教育記實〉也是其中之一。而王國維留學日本的時間，正是日本教育界盛行德國赫爾巴特學派的時期，也可以想見何以從第四十八號起，《教育世界》開始刊載介紹德國近代教育的論文或譯文，包括：〈德國小學制度述略〉、〈德國小學教育〉、〈德國現行小學校編制法〉、〈德國小學教育現狀〉、〈德國女子中等教育〉等等。在《教育世界》的帶動之下，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中國各地相繼辦起了數十家教育官報或雜誌<sup>76</sup>，而上海商務印書館也加入此一行列，於一九〇九年正月開始發行《教育雜

<sup>73</sup> 郭三娟：〈述評清末民初新學制對日本學制的模仿〉，《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頁81。

<sup>74</sup> 劉立德：〈中國教育史學科教材沿革及改革初探〉，《課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9期，頁55。

<sup>75</sup> 馮克誠總主編，北京師聯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選：《中國教育名家名作精讀叢書第五輯：俞子夷小學教學思想與教育文論選讀》（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26-227。

<sup>76</sup> 朱蒙：〈近代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刊物——《教育世界》〉，《中國教師》總80期（2009

誌》。作為日本教育體制原型的德國近代教育，也就隨著教育類雜誌的盛行，被引介至中國，其中赫爾巴特的教育學說尤其受到重視<sup>77</sup>。小泉又一於一九〇四年所寫的《教育史》及一九〇七年寫的《近世教育史》也提到，自《教育敕語》公布之後，原本倍因氏 (Alexander Bain, 1818-1903) 與須氏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這類來自英國的實利主義漸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德國赫爾伯特學派的德育主義<sup>78</sup>。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赫爾巴特的教育學說，是經由日本扮演的仲介角色，轉介到中國來的。但經過了日本的轉譯過程，不免令人懷疑這樣的赫爾伯特學派是否仍是原汁原味。赫爾伯特把教學過程分成了明瞭、聯想、系統、方法四個形式階段，他的弟子戚勒 (Tuiskon Ziller, 1817-1882) 把第一階段「明瞭」再分成「分析」和「綜合」兩個階段，形成五段教學法。戚勒的弟子萊因 (Wilhelm Rein, 1847-1929)，又重新將這五個階段命名為：預備、提示、聯想、總括、應用。事實上，明治時期日本學界盛行的已經是萊因所總結的五段教學法，而非赫爾伯特原始的四段教學法<sup>79</sup>。小泉又一在一九〇七年與乙竹岩造共同編寫《小學校各教科教授法》，在第一章第三節「修身科」「教授の方法」（教授的方法）中，他將教學過程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豫備」、「提示」、「比較」、「概括」、「應用」<sup>80</sup>，可看出小泉又一在教學法上確實遵循了此學派的五段教學法。

然而，這樣的五段教學法進入了日本社會，卻可能因為受到日本由來已久的儒家文化影響而產生變化。湯本武比古在其《教授學》書中便提出：「孔子者固於二千四百餘年以前早已立此五段之次序矣。」<sup>81</sup>他甚至還寫了一本《孔子ノ五段教授法：新編教授學追加》（孔子的五段教授法：新編教授學追加）<sup>82</sup>，說明孔子的「憤」、「啓」、「悱」、「發」、「三隅反」就相當於赫爾巴特的五

年1月），頁56-57。

<sup>77</sup> 蕭朗、葉志堅：〈王國維與赫爾伯特教育學說的導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2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76-82。

<sup>78</sup> 小泉又一：《近世教育史》（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年），頁252。

<sup>79</sup> 蕭朗、葉志堅：〈王國維與赫爾伯特教育學說的導入〉，頁79-80。

<sup>80</sup> 小泉又一、乙竹岩造編：《小學校各教科教授法》（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年），頁11-12。

<sup>81</sup> 轉引自周谷平、葉志堅：〈赫爾伯特教育學在中國：一個跨越世紀的回望〉，《教育學報》第2卷第5期（2006年10月），頁31。

<sup>82</sup> 湯本武比古：《孔子ノ五段教授法：新編教授學追加》（東京：湯本武比古，1895年）。

段教學法。當時另一位教育家谷本富也以儒家的觀念來詮釋赫爾巴特的五種道德觀念，在他的《科學的教育學》書中，他把赫爾伯特原本的五種道德觀：內心自由 (inner freedom)、完美(perfection)、仁慈 (benevolence)、權利 (rights)、公平 (equity) 稱為五道念，並且把這五道念與儒家德目的信、智、仁、禮、義互相對應<sup>83</sup>。這種情形或可稱之為融合或挪用，本來個人主義濃厚的西方教育思想，在強調國家主義及社會教育的文化之中產生了變化。十九世紀八〇年代之後，儒家的德育論與軍國主義思想逐漸佔上風，勝過了歐化及民權思想。國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傳統的國學和儒學，西學派也逐漸與民族主義思想一致<sup>84</sup>。一八八一年日本政府公布的〈小學校教員心得〉，強調教師應強化學生的道德教育，使學生忠於皇室，愛國家，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對朋友有信，對卑幼有慈，並以己身為模範，以薰染學生之德性，感化其善行<sup>85</sup>。這段內容正反映出日本政府對小學教師的期望是以儒教倫理為基礎，強化道德教育，再加上國體主義的教育理念。一八九〇年以天皇名義下達的《教育敕語》明確指出，教育的淵源在於國體精華，以維護天皇制為目的。此敕語同時也規定臣民必須遵守儒教倫理及重國憲、遵國法的立憲主義思想，這種強制性的全民教育，成為全民的行為道德規範，幾乎等於是確立了日本國民教育的根本方針<sup>86</sup>。

在現代化的過程，新式學校的紛紛成立，範圍更是從都市擴及鄉村，師資自是極為缺乏，因此師範教育的實施成了現代化的當務之急。而《棄石》或《埋石棄石記》這類以師範生畢業後到鄉村學校教書為主題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促成國家教育現代化的一大助力，背後的意識形態不言可喻。日本明治政府意識到培養師資的重要，於是在一八七二年設立東京師範學校，延聘美國教師史考特 (Marion McCarrell Scott, 1843-1922) 主持其事，採用歐美教科書及教材來訓練學生，學生畢業後分發到各地方負責籌設中下級師範學校，培育中學及小學

<sup>83</sup> 田中克佳：〈西洋教育思想の移入と實踐・小史——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第15號（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1975年），頁55。

<sup>84</sup> 小林哲也著，徐錫齡、黃明皖譯：《日本的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頁28。

<sup>85</sup> 榎本隆司：〈教育小説全〉，《學術研究・國語・國文學編》第25期（東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1976年），頁67。

<sup>86</sup> 吳建華、潘毅文：〈日本與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歷史考察〉，《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2期，頁100。

師資<sup>87</sup>。《棄石》的故事內容正呈現這樣的社會脈絡。主角小西誠一就讀師範學校，在畢業之前與二十幾位同學到校長家聚餐，校長的一段訓勉之言，傳達出對小學教師的期望，包天笑的譯文也翻譯出這種期望：「諸君今日所任小學教員，則即各國之所謂國民教員，為吾輩後一代之國民，造就此一班有益於國家之人材，其責任良匪輕也。蓋凡國體之尊嚴，國家之隆運，均操諸諸君之掌握，竊謂教育家者，猶之建築屋宇時埋入土中之礎石，更如築堤時投入水中之棄石也，此決非人目所能顯見，而屋宇之堅牢，防堤之完密，則直視此埋石棄石之功。」<sup>88</sup>

在這種現代化的過程，與過去的教師最大的不同，在於教師的專業化開始受到重視。無論是師範學校的設立，教育專著的譯介，教育類雜誌的大量發行，都意味著整個社會對於教師這樣的角色開始有專業化的期待，認為教師應接受適當的訓練，在教材教法方面應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而這種期待是傳統教育所未見的。然而在此同時，無論是日本或中國，對於教師的道德標準，卻仍然保有傳統儒家的思想，教育小說便是這種期待的投射，而這種知識上傾向西方，道德上傾向東方的情況，形成一種極其特殊的調和作用。

## 五、喜新不忘舊：年少有為、孝勇兩全之大丈夫

在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無論是傾向西化的改革派，或是強調本邦傳統的保守派，他們的思想內部終究無法脫離儒家思想的影響<sup>89</sup>。誠如津田左右吉所言：「即便是反抗並敵視支那思想者，在其主張的根柢處也潛在著這種來自支那古典的知識，並為其所制約。」<sup>90</sup>町田三郎認為，明治時期許多啓蒙家關心的焦點集中於西歐進步的政治、制度、法制之類的外在方面，從中吸取先進經驗，但這樣容易造成他們精神的二重結構，也就是說，儘管是像中村正直這樣的啓蒙主義

<sup>87</sup> 蘇雲峰著，吳家瑩編校：《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頁 56-57。

<sup>88</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 8-9。

<sup>89</sup> 彭之洵：〈從明治時代的教育政策看儒學於近代日本之影響——以《教學聖旨》及其相關論爭為中心〉，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於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舉行之「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頁 13。網址：<http://www.nknu.edu.tw/~jingxue/download/100jingpdf/1000708.pdf>，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3 日。

<sup>90</sup> 轉引自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年），頁 117。

者或社會改良者，也可能回歸為孔子信奉者<sup>91</sup>。自一八八八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這段時期，日本人對於盲目的歐化主義開始強烈的反省，逐漸重視固有文化的優點<sup>92</sup>。《棄石》出版於一九〇七年，自然也反映出這樣的社會氛圍，嘗試調和新舊兩種文化，在智育的表現上傾向學習西方制度，而在德育的表現上傾向傳統儒家思想<sup>93</sup>。在著書立說方面，先是效法英、美，後又取法德國，各種教育理論與教學法的論述向西方學習，然後逐漸融入東洋道德。在教育小說的創作方面，當然也反映了對新式教育的描述，以《棄石》為例，專業的師範學校培育出有如「埋石棄石」之師範畢業生<sup>94</sup>，每堂課的上課下課時間依照鐘聲作息<sup>95</sup>，教學活動有「傳旗遊戲」<sup>96</sup>，教師於暑假期間回母校參加十餘日縣教育會主辦的講習，進修倫理學與教育學<sup>97</sup>，這些都是新式教育在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專業進修方面呈現的新氣象，但同時卻也在小說中透過孔、孟之言，期待教師具備「大丈夫」的品格<sup>98</sup>。

從題材來看，日系教育小說是一種理想投射型的類自傳，小泉又一、包天笑、葉聖陶都曾經是教育工作者，他們選擇以教師這種職業為描寫主體，反映出他們本身的背景經歷，而故事中的主角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心目中的教師形象，因此幾乎可以說他們藉由這類教育小說翻譯了自我<sup>99</sup>，也翻譯了他們心目中的教師。就外貌而言，小泉又一筆下的小西誠一，「年齒不過二十一、二、三歲，身材適中，面容細瘦，鼻樑挺直，雙眼如滴水星辰般惹人憐愛，抿成一直線的

<sup>91</sup> 町田三郎著，馬振方、馬小立譯：〈明治漢學紀要（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3期，頁101。

<sup>92</sup> 黃得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之漢學研究——一百年來日本漢學研究之科學化〉，《黃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396。

<sup>93</sup> 彭之洵：〈從明治時代的教育政策看儒學於近代日本之影響——以《教學聖旨》及其相關論爭為中心〉，頁13。

<sup>94</sup> 小泉又一：《棄石》，頁19-20。

<sup>95</sup> 同前註，頁31-32。

<sup>96</sup> 同前註，頁32-33。

<sup>97</sup> 同前註，頁35。

<sup>98</sup> 《埋石棄石記》主角沈寶銓於小說一開始便隨行隨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頗有自勉之意。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1。

<sup>99</sup> 葉聖陶中學畢業後，因家貧無法繼續求學，他和幾位同學去找中學校長袁希洛，在校長協助下，他們幾位去公立小學當教師。這與《埋石棄石記》沈寶銓受校長鼓勵到鄉下小學任教的這段情節非常類似。

嘴巴帶有凜然堅貞的意志」<sup>100</sup>。包天笑筆下的沈寶銓「年齒約在二十左右，身材適中，鼻直而口方，星眼閃閃，頗籠活潑之精神，而觀其狀態，似有堅貞之意志」<sup>101</sup>。兩者在外表的描述上頗為一致，教師形象皆為翩翩少年，且透露出堅強之意志。相形之下，明清時期的民間文學常可見到嘲諷村學究的作品，陳寶良認為，在明清民間的印象中，傳統私塾教師已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形象，以湯顯祖的《牡丹亭》為例，老儒陳最良上場之時已年值六旬，是一個「腐儒」的典型<sup>102</sup>。梅家玲認為「較之於晚清文人筆下瞎搞胡混的冬烘教師」，《埋石棄石記》書中青年教師形象的正面意義確實有氣象一新之感<sup>103</sup>，這與梅家玲所提出以「少年中國」揮別「老大帝國」的心態似可互相呼應。梁啟超當時受日本影響而產生了「少年中國」的論述，在其透過日譯本轉譯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也多次提及「少年意大利」、「少年瑪志尼」等語<sup>104</sup>。這種少年形象意味著改革的新氣象，年輕教師下鄉服務，似乎也意味著即將帶給鄉下學校現代化的新希望。

而就品格來看，小泉又一與包天笑呈現出來的教師，是個「孝」、「勇」兩全的儒家君子。在孝順方面，小泉又一花了許多篇幅描述小西誠一與寡母同住的相處情形，主角將母親接來同住，在母親生病時細心照顧、多方求醫。包天笑更是多處以「孝」來描述沈寶銓，包括沈寶銓的母親「深感其子之有孝心」<sup>105</sup>，又說：「蓋沈寶銓者，純孝而有至性之人也。」<sup>106</sup>鄰家一位薛婆也對沈寶銓讚美有加，說：「又聞先生對於阿母能盡孝道。」<sup>107</sup>而沈寶銓的母親痊癒，也是因

<sup>100</sup> 「年齒は二十歳の上を一か二か三までとは行かぬらし。中肉中脊。細面にして鼻筋通り、水も滴らん星の如き雙眼には云ふべからざる愛嬌の籠りて、一文字に引き締まれる口元には、凜々しき意志のいかに堅かるべき。」引文係筆者所逕譯。小泉又一：《棄石》，頁3。

<sup>101</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1。

<sup>102</sup> 陳寶良：〈「富不教書」：明清塾師之生存狀態及其形象〉，《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67-68。

<sup>103</sup> 梅家玲：〈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臺北：麥田出版，2013年），頁90。

<sup>104</sup>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57。

<sup>105</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11。

<sup>106</sup> 同前註，頁12。

<sup>107</sup> 同前註，頁30。

爲「殆天鑒沈寶銓之純孝而至誠之真，足以感格上蒼」<sup>108</sup>。而在英勇方面，主角在一次水災事件的英勇表現，便足以證明他勇於捨生取義的精神。《棄石》裏的小西誠一在狂風暴雨、洪水暴漲的夜晚，心繫校舍安全，不顧危險投身於波濤洶湧的洪水之中。《埋石棄石記》裏的青年教師沈寶銓，比日文小說的小西誠一更臻完美，在這場水災當中，他「血旺氣盛，一遇事變，即誓死赴義，其勇往直前之意氣，有足令人起敬者」<sup>109</sup>。不但搶救了學校的重要文件<sup>110</sup>，更在滔天巨浪之中，奮不顧身解救了快要淪爲水中波臣的孤兒寡母。日文小說《棄石》並無救人情節，但包天笑卻刻意增添這段英勇事蹟，描述沈寶銓如何「心念鄰家一孤兒」，於是他「縱身攀樓窗而左，則聞隨風送此哀呼救命之聲……始覺一婦人方攀援一松樹，尙力抱懷中之兒弗釋也……兒見寶銓即大呼：『沈先生救我母子也。』寶銓曰：『無妨，我必出汝於險……』」<sup>111</sup>。這位青年教師不僅事親至孝，無怨無悔獻身於兒童，致力於貧窮村落的教育事業，甚至寧可放棄升學或轉調大城鎮的機會。除了諸多品德表現之外，沈寶銓還具備了令人敬佩的英雄氣概，這種操縱印證了包天笑企圖塑造孝勇兩全的教師形象<sup>112</sup>。

除了孝順與英勇之外，作者以孟子對大丈夫的定義，在《棄石》書末表達出對小西誠一的期望，包天笑則是把這段話提到全書最前面。在《棄石》書中，小泉又一在最後一節提出小西誠一抱持的信念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113</sup>。包天笑把這段放到中文版的最前頁，描述沈寶銓喃喃自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114</sup>而同一場景的日文版小西誠一則是一邊散步一邊吟誦：「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生我所欲，義我所欲。」<sup>115</sup>同樣也是孟子之言，只不過小西誠一話還沒說完，就因朋友出現而中斷了話語。無獨有偶，小泉又一在一九一三年重新修訂出版的《改訂普通教育學》緒論中，開宗明

<sup>108</sup> 同前註，頁 35。

<sup>109</sup> 同前註，頁 48。

<sup>110</sup> 在小泉又一的《棄石》書中，主角小西誠一搶救的是明治天皇的「御聖影」。小泉又一：《棄石》，頁 83-85。

<sup>111</sup> 同前註，頁 49-50。

<sup>112</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爲視角的考察〉，頁 8。

<sup>113</sup> 「富貴淫する能はず、貧賤移する能はず、威武屈する能はず。」引文係筆者所逡譯。小泉又一：《棄石》，頁 274。

<sup>114</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 1。

<sup>115</sup> 小泉又一：《棄石》，頁 2。

義便引用孟子的話：「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sup>116</sup>這些語出《孟子》的聖賢之言，說明了小泉又一與包天笑對這位教師主角的期待。他們心目中完美的理想教師是儒家傳統的大丈夫典範，「生我所欲，義我所欲」，若生與義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

包天笑除了同樣呈現小泉又一所引用的孟子之言以外，他在書中一開始也添加了孔子之言：「孔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所以見爲師之不易也。」<sup>117</sup>其尊孔敬孟之心可見一斑，不過要附帶一提的是，包天笑似乎掉錯了書袋，這句話其實是語出《孟子·離婁篇》，而非孔子所言。另一處包天笑還增添了宋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sup>118</sup>。這種憂國憂民，以天下爲己任的胸懷，也是包天笑所期望看到的教師特質，添加捨身爲人的搭救情節便可看出包天笑的意圖，無怪乎包天笑總說自己的譯作「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sup>119</sup>。或許也可以說，可能一開始就是因爲《棄石》儒家思想濃厚，才會得到包天笑或《教育雜誌》的青睞而選來翻譯並刊載。儘管小泉又一在前言中說到自己想寫出像裴斯泰洛齊那樣的理想教師，而在書中他又提出另一位德國小學教師デルプフヘルド (Friedrich Wilhelm Dörpfeld, 1823-1893) 爲榜樣，但無論是包天笑筆下的沈寶銓，還是小泉又一筆下的小西誠一，雖然是受過新式師範教育的教師，卻還是表現出濃厚的儒家君子或大丈夫的形象與特質。另一方面，小泉又一儘管寫了許多教育專著，引介歐美各國的教育制度與思想，但是在他自己創作小說的時候，卻創造出一位典型儒家式的教師典範，而這種儒家式的教師，更是包天笑這樣偏向傳統教育的文人所偏好的典型。包天笑在一九一四年時還自己寫了《青燈回味錄》，細細回味起傳統教育，可見儘管他在傳播新教育思想的《教育雜誌》譯述了多篇教育小說，但他對於傳統教育還是充滿懷舊之感。

事實上，如果回頭去檢視先前所提的各篇日系教育小說，會發現小西誠一、沈寶銓、甚至是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都呈現了類似的完美教師形象。無緣居士的〈私の先生〉（我的老師）故事中，主角感受到與學生之間的互動緊密而最後決定不要轉校任教，寧可與母親及妻子分隔兩地；三浦圭三的〈女教師〉堅信這

<sup>116</sup> 小泉又一：《普通教育學》（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3年），頁1。

<sup>117</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3。

<sup>118</sup> 同前註，頁6。

<sup>119</sup>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463。

世上唯有教職這艘船能乘風破浪，排除困難，甚至忘了世上還有其他遊樂戀愛等事情；宮崎雪洲筆下的女教師也是到鄉下學校教書，堅持不願轉校；石川榮司的《理想の小學教師》（理想的小學老師）故事中，主角山田道雄立志成爲教師，並進入師範學校，最後也跟小西誠一和沈寶銓一樣升爲校長；蓮實珂川的《村夫子》也是描寫主角安雄一路從教員升至校長的地位。這類以教師爲主體的故事，如果再繼續往上回溯，或許還可以追溯至江戶時期中江藤樹這位村夫子 (a village teacher) 所立下的教師典範。一八九四年內村鑑三 (Kanzo Uchimura, 1861-1930) 以英文寫作的 *Japan and Japanese* (日本與日本人)<sup>120</sup>，提出五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其中一人便是中江藤樹 (1608-1648)。中江在父親死後，立刻把母親接來同住以便盡孝，二十八歲時，他在鄉下開始教書，同時也關心鄉里事務，一心教導學生成爲「君子」(kunshi)。他後來成爲日本儒家陽明學派的創始人，在近江講學，後人尊稱爲「近江聖人」。由內村鑑三的書中可以看出，以儒家君子爲典範的鄉村教師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日本人，而這種典範即便到了新式教育的時代，在日系教育小說中仍然延續著，也因爲翻譯至中國而影響了包天笑及葉聖陶的教育小說。當然，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創作小說，葉聖陶所創作的教育小說逐漸開展出自己的路線，以其《倪煥之》爲例，儘管部分內容與包天笑所譯的《馨兒就學記》與《埋石棄石記》雷同<sup>121</sup>，但倪煥之與蔣冰如實施的現代化教學法，例如農場教學與戲劇演出，以及他參與政治革命而最後理想破滅的結局<sup>122</sup>，可看出日系教育小說對中國教育小說確實有所啓發，但葉聖陶卻也從中開創出新局。

整體來看，日系教育小說可以說呈現出一種外在與內在，實學與虛學，行動與思想，智育與德育之間一種調和的嘗試。小泉又一著書立說，一方面推廣德國赫爾巴特學派，另一方面卻又塑造出充滿儒家思想的鄉下村夫子，這種調和反

<sup>120</sup> 一九〇八年此書修訂版將書名改爲 *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 (代表的日本人)，仍由警醒社出版，其中頁一三九至一七八記述的便是村夫子中江藤樹的事蹟及思想。

<sup>121</sup> 主角倪煥之與包天笑《埋石棄石記》的主角沈寶銓有不少相似之處。故事都從兩人即將到某個鄉下小學就任開始，兩人擔任教職之後，皆與母親相依爲命，而促成主角投身教育事業的原因，也是肇始於校長之言。兩人皆有一位過去的同窗繼續升學高就：沈寶銓的同學張福田升學入高等師範，倪煥之的同學王樂山則是升學入了大學預科。眼見昔日同窗得以朝更高處邁進，兩位主角也同感悵然。而藉由書中人物之口大談教育理想的情形，兩部作品同樣非常類似。

<sup>122</sup> 拙作：〈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爲視角的考察〉，頁 12。

映出當時的普遍現象。在日本，面對洋學與國學，「對明治政權而言，要面向近代化，就必須對舊國學進行解毒；但國家的正統性和中心性確立，事實上又離不開國學的繼續支持」<sup>123</sup>。明治政府意識到西化對國權的威脅，原本在明治前期失去主導地位的儒學，又重新爲了集約國民感情的需求而還魂復甦，於是明治政府調整教育方針，轉爲以儒教倫理爲主<sup>124</sup>。此論述在教師典範的塑造上也發揮了作用，然而這種調和的作用到了中國，經過五四運動之後，隨著包天笑的教育小說從《教育雜誌》中消失，新一代的編輯與創作者出現之後，以教師爲描寫主體的小說在中國開始有了新的面貌，開始揭露教育界的問題以及對教育現狀的反思與批判<sup>125</sup>。

## 六、結語

本研究所謂的「翻譯」教師，指的並非語言之間的翻譯，而是跨越至另一個文化的思想翻譯。包天笑藉由翻譯《埋石棄石記》而樹立教師典範的意識形態，在《埋石棄石記》全文最末說得很清楚：「嗚呼，讀者諸君，我著是書，未敢以豪傑魁碩望我國民，特描摹此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脫人人能以棄石埋石爲心，則國家之基礎，烏有不堅者乎？」<sup>126</sup>然而小泉又一與包天笑筆下的教師典範，其實是品格儒家化而專業現代化的調和之範例。在進行現代化的大敘事當中，保守舊道德的小敘事仍然持續進行著。即便小說中的教師是新學校新教育的實踐者，但呈現出來的儒家式教師形象卻以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爲標竿，特別著重於「孝」、「勇」兩種品格，前者可見於主角與母親的互動，後者可見於水災救人的事蹟。這種作法在晚清文人林紓的譯作中也曾出現，李歐梵曾提到林紓在《斐洲煙水愁城錄》書中將白人英雄 Curtis「儒家化」，只著墨友愛與兄弟之情，另外也在《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中強調英雄的孝道<sup>127</sup>。在中國晚清與日

<sup>123</sup>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頁 122。

<sup>124</sup> 陳瑋芬：〈自我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8 期（2001 年 3 月），頁 381-383。

<sup>125</sup> 魯迅的《高老夫子》，老舍的《老張的哲學》，葉聖陶的《校長》、《風潮》、《潘先生在難中》，都是典型的這類作品。王粹：《清末新政時期教育小說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教育史碩士論文，2010 年），頁 37。

<sup>126</sup>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頁 120。

<sup>127</sup> 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收入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

本明治時期這樣翻譯活動蓬勃興盛的時代，所謂的舊與新、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都是一個連續體，各種文化或思想在這個連續體中左右游移，未必每一種思想都朝同一方向線性發展，換句話說，未必一定是從舊到新，從東方學習西方，從傳統走向現代。以《棄石》與《埋石棄石記》而言，書中所樹立的教師典範，還是典型的儒家君子之形象，讀來似有「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之感。

從廣義的翻譯或跨文化的角度來看，對於外來文化進入異域文化的情況，我們已經知道不可能以簡單的二元論來看待，單純以為只有接納與抵抗兩種情形。後殖民主義者道出了二元論的盲點，指出雜揉、混種、第三空間等可能性，然而日系教育小說點出了另一種可能性：部分接納，部分抵抗。日本的明治社會在某部分擁抱西方新思想，在另一部分堅守傳統，弘揚儒家文化；作為教育家的小泉又一鼓吹歐美教育思想，但作為教育小說作家的他，念茲在茲的卻是孟子的儒家思想。小泉又一在《歐美教育實際》中也曾說到：「我國所固有之長，不可不盡力以恢復之，我國所短者，不可不竭智以挽回之。」<sup>128</sup>這種調和的努力體現在「教育小說」從日本到中國的傳承與衍變。關於理論和思想旅行的方式，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旅行理論」提出了四個主要階段，在最後的階段，已經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納（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時間與空間中的新位置所改變<sup>129</sup>。其實如果再更細緻地思考，小泉又一的日本儒家思想與包天笑的中國儒家思想，也不盡然是相同的。明治時代以前的日本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之深，必然也發生過接納、抵抗、雜揉的狀況，最後才形成日本國獨特的儒家思想。小泉又一在其教育小說中所樹立的教師典範，似乎試圖要恢復日本國「固有之所長」，但此「固有之所長」本身早已是滲透了漢文化的日本文化。

包天笑配合《教育雜誌》，以教化人心的意識形態來譯介小說，扮演文化中介者的他，促成以教師為描寫主體的日系教育小說在中國形成，影響了近代中國教育小說的發展。正如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言：「翻譯在建構異域文本與文化的本土再現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本土主體，這是一個可資理解的位置

---

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頁35。

<sup>128</sup> 小泉又一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緒言〉，《歐美教育實際》，頁397。

<sup>129</sup> 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李自修譯：《世界，文本，批評家》（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400-401。

(a position of intelligibility)，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由特定的本土社群的符碼和典律以及利益和關懷所形塑。」<sup>130</sup>不過，也由於意識形態太強，這類文學作品若脫離了時代脈絡，因為缺乏文學價值，便很容易消失在歷史洪流中。如同沃洛希諾夫 (Valentin Volosinov, 1895-1936) 所說：「一個意識形態事物，只有和某一特定時代的行為意識形態發生了不可割裂的有機聯繫，才能在那個時代生存（當然是為了特定的社群）。離開和行為意識形態的聯繫，它就無法存在，因為它無法被經驗為有意識形態意義的事物。」<sup>131</sup>意識形態所催生的作品脫離了特定時代便難以為繼，《埋石棄石記》這類作品強調完美品德的教師典範，又局限於「杏壇芬芳錄」之類的內容<sup>132</sup>，終究只在浩瀚的翻譯文學史中留下一絲雪泥鴻爪，不過日系教育小說在日本及中國提倡新式教育的時期能夠盛行一時，自然有其時代意義及歷史價值，足以讓我們觀察並思考翻譯文學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

---

<sup>130</sup> 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著，查正賢譯：〈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收入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29。

<sup>131</sup> 沃洛（布）〔希〕諾夫 (Valentin N. Voloshinov) 著，曾憲冠等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同前註，頁77。

<sup>132</sup> 家永三郎形容為：「描繪成活脫脫出自修身教科書的人物。」（修身教科書からぬけ出してきたような人物として描き出されている。）家永三郎：〈「教育小説」の系譜とその意義〉，頁54。

## 翻譯「教師」

### ——日系教育小說中受到雙重文化影響的教師典範

陳宏淑

清末文人包天笑翻譯的教育小說大多從日本翻譯或轉譯而成，其中有一類以教師為主體，形成了新的文類特色，延續到民國之後葉聖陶的教育小說。這類教育小說與西方源自德國的教育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非常不同，不僅描寫的主體不同，而且除了學校生活之外，更藉由教師的形象、話語、各種事件，傳達新式教育的教育論述。《埋石棄石記》可說是最明顯的典型。本研究先探究明治時期教育小說的發展，探查當時日本的社會如何調和歐洲新思潮與日本傳統儒家思想，再以此書為個案探討書中的教師典範。換言之，本研究想了解包天笑翻譯出來的「教師」反映出怎樣的特質，而經由從歐洲譯入日本，再譯入中國的新式教師形象，與儒家傳統教師形象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交會與調和。

關鍵詞：包天笑 小泉又一 教育小說 教師典範

## Translating “Teacher”: The Role Model in the Education Nove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al Cultures

CHEN Hung-shu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o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o Tianxiao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education novels, either directly from Japanese originals or indirectly from Western novels by way of Japan. His direct translations, usually with a teacher as the main character, constituted a new genre, with its special feature being a focus on a teacher’s personal and school life. Such a theme was also noticeable in the education novels written by Ye Shengtao. The Japanese-style Education Novel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Bildungsroman, which spread from Germany to various Western countries, although it is similarly termed as a Novel of Education. In the Japanese version, the main character is usually a teacher. In addition to the description of school life, the Japanese Education Novel tends to express a discourse of modern education through the utterances, related events, and the presented image of the teacher.

*The Story of Buried or Thrown Stones (Maishi Qishi Ji)*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a Japanese-style education novel. In this study I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Novel in Meiji Japan and discuss how Meiji society blended Western modernism with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its new system of education. Then, I use this book to demonstrate how Bao presents a role model through his rendering of the Japanese original 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al cultures. In other words, this study analyzes qualities of the teacher that Bao translates in this Japanese-style education novel, and what kind of reconcili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the teacher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rn image of the teacher as it was shaped on its journey from Europe to China via Japan.

**Keywords:** Bao Tianxiao Ye Shengtao Education Novel role model

## 徵引書目

- 小林哲也著，徐錫齡、黃明皖譯：《日本的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 小泉又一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歐美教育實際》，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
- 天笑生譯：《埋石棄石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
- 田正平、陳桃蘭：〈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介與新教育思想的傳播〉，《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3期，頁208-215。
- 、楊雲蘭：〈中國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2005年1月，頁5-13。
- 朱蒙：〈近代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刊物——《教育世界》〉，《中國教師》總80期，2009年1月，頁56-57。
- 吳建華、潘毅文：〈日本與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歷史考察〉，《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2期，頁96-103。
-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年。
- 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收入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 沃洛（布）〔希〕諾夫(Valentin N. Voloshinov)著，曾憲冠等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收入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入王汎森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 町田三郎著，馬振方、馬小立譯：〈明治漢學紀要（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3期，頁100-104。
- 周谷平、葉志堅：〈赫爾巴特教育學在中國：一個跨越世紀的回望〉，《教育學報》第2卷第5期，2006年10月，頁29-35。
- 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著，夏丏尊譯：《愛的教育》，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 胡海義：〈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清末教育小說的興起〉，《教育評論》2010年第6期，頁126-129。
-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著，查正賢譯：〈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收入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徐云知：《李綠園的創作觀念及其《歧路燈》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5年。
- 徐光台：〈明清西學東漸與中國思想和教育的交流與衝激：回顧與展望〉，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 哥德斯密著，譯者不詳：〈姊妹花〉，《教育世界》第69號，1904年1月，頁63-72。

-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49-276。
- \_\_\_\_\_：〈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中外文學》35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55-183。
- \_\_\_\_\_：〈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入梅家玲主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
- \_\_\_\_\_：《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臺北：麥田出版，2013年。
- 章慰高撰述，章希聖補記：〈自述教育生活小史〉（1948年），《蘇州地方志》，網址：<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214327.htm>，檢索日期：2013年11月5日。
- 郭三娟：〈述評清末民初新學制對日本學制的模仿〉，《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頁79-82。
- 郭延禮：〈中國教育小說的初端〉，《20世紀中國近代小說在全球的傳播》，2005年9月19日。網址：<http://blog.cersp.com/18893/109759.aspx>，檢索日期：2007年7月24日。
- 陳宏淑：〈包天笑與民初「教育小說」概念的建構——以「日文中譯」為視角的考察〉，《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6輯，2013年12月，頁1-15。
- 陳瑋芬：〈自我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3月，頁367-420。
-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頁206-212。
- \_\_\_\_\_：〈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48-161。
- 陳寶良：〈「富不教書」：明清塾師之生存狀態及其形象〉，《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0年4月，頁64-70。
- 黃得時：《黃得時全集10——論述卷四》，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年。
- 黃新憲：〈簡論近代中國對日本教育近代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鑒〉，《教育理論與實踐》1995年第4期，頁15-17。
- 彭之洵：〈從明治時代的教育政策看儒學於近代日本之影響——以《教學聖旨》及其相關論爭為中心〉，2011年11月5日於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舉行之「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網址：<http://www.nknu.edu.tw/~jingxue/download/100jingpdf/1000708.pdf>，檢索日期：2013年12月3日。
- 馮克誠總主編，北京師聯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選：《中國教育名家名作精讀叢書第五輯：龔子夷小學教學思想與教育文論選讀》，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廖咸浩：〈有情與無情之間：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幼獅文藝》第83卷第7期，1996年7月，頁81-88。
- 趙娟：《中國近現代教育小說研究》，保定：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論文，2011年。
- 劉小滿：《中西教育小說比較研究》，瀋陽：遼寧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論文，2011年。

- 劉立德：〈中國教育史學科教材沿革及改革初探〉，《課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9期，頁55-58。
- 韓永勝：《中國現代教育小說概論》，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
-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
- 蕭朗、葉志堅：〈王國維與赫爾巴特教育學說的導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2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76-82。
- 蕭菊梅：〈教育譯著的導入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33卷第2期，2011年3月，頁23-28。
- 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李自修譯：《世界，文本，批評家》，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 羅炳良主編：《張之洞〈勸學篇〉》，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623-632。
- 蘇雲峰著，吳家瑩編校：《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
- 小泉又一：〈歐米にて觀察したる幼稚園〉，《婦人と子ども》第3卷第7號，東京：フレール會，1903年，頁39-47。
- \_\_\_\_\_：《增訂日本歐美教育制度及方法全書》，東京：東亞公司、富山房書局，1907年。
- \_\_\_\_\_：《近世教育史》，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年。
- \_\_\_\_\_：《棄石》，東京：同文館，1907年。
- \_\_\_\_\_：《普通教育學》，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3年。
- \_\_\_\_\_、乙竹岩造編：《小學校各教科教授法》，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年。
- 小熊伸一：〈明治後期における教育學術・實際雜誌の創刊とその役割——『教育實驗界』と『教育學術界』を中心として—〉，《立教大學教育學科研究年報》第34號，東京：立教大學文學部教育學科研究室，1990年，頁75-89。
- 天野淡翠、河井咀華：《教師の妻》，東京：教進社，1904年。
- 田中克佳：〈西洋教育思想の移入と實踐・小史——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紀要》第15號，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1975年，頁53-59。
- 石川榮司：《理想の小學教師》，東京：育成會，1906年。
- 和田敦彥：〈「教育」の言説と讀書のパラダイム〉，《日本近代文學》第55號，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96年，頁15-31。網址：<http://fan.shinshu-u.ac.jp/~wada/report/kikufile.html>，檢索日期：2010年7月5日。
- 柳田泉：〈明治時代の傾向小説〉，《續隨筆明治文學》，東京：春秋社，1938年。
- 家永三郎：〈「教育小説」の系譜とその意義〉，《文學》第38期，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53-64。

- 湯本武比古：《孔子ノ五段教授法：新編教授學追加》，東京：湯本武比古，1895年。
- 新井周吉口述，岡野宇太郎筆記：《教育小説》，東京：鳴東館，1886年。
- 榎本隆司：〈教育小説全〉，《學術研究・國語・國文學編》第25期，東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1976年，頁57-69。
- 蓮實珂川：《村夫子》，東京：育成會，1908年。
- 藤原喜代藏：《明治・大正・昭和和教育思想史》第一卷，東京：日本經國社，1944年。
- Hartmann, Rudolf. "Japanische Studente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1870-1914," *Kleine Reihe* 1(1997): 3-93. (accessed Nov. 23, 2013) at <http://edoc.hu-berlin.de/series/kleine-reihe/1/PDF/1.pdf>.
- Hermans, Theo. "Disciplinary Objectives: The Shifting Groun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erspectivas de la Traducción Inglés/Español. Tercer Curso Superior de Traducción*, eds., Purificación F. Nistal y José María Bravo Gonzalo. Valladolid: Instituto de Ciencias de la Educación,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9.
- \_\_\_\_\_.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 Hill, Michael Gibbs. *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Homepage der Ostasienabteilung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accessed Nov. 10, 2013) at <http://crossasia.org/digital/japans-studierende/index/show>.
- Moretti, Franco.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7.
- Uchimura, Kanzo. *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 Tokyo: Keiseisha, 1908.